

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

曹 淑 娟*

提 要

本文探索杜甫（712-770）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除前言、結語外，主文包括三部分：其一、探論杜甫棄官離京的多重性意涵，是為漂泊的開始；其二、尋索杜甫何以不能安居秦州、同谷，一再展開流動的過程；此二單元用以彰明浣花草堂作為整體流動經驗中一段停駐的里程。其三、闡述成都浣花草堂的建構及其倫理實踐意涵，尤為本文重心，彰顯杜甫在草堂中逐步舒展的人性體驗，重整與人倫品物的關係。杜甫興造草堂，以草堂為據點，建構了自己新的社會身份與生命格局，草堂也因詩人的寓居而成為成都的新地景，參與進地方歷史記憶的建構。

浣花草堂作為唐代早期文人園林基型之一，相較之下，王維（701?-761?）輞川別業、白居易（772-846）履道宅園、廬山草堂等文人園林主流，傾向於背離社會人群，也弱化了家庭人倫關係，走向個人自得的內在世界，它們引領了宋明以降的園林朝向模擬壺中天地發展。杜甫浣花草堂則展示了不一樣的生​​命格局與人文意涵，筆者認為正是杜甫的影響力滲透進後代文士的園居心態，文士傳承著覺知的高度，接受現實世界中的層層磨難，在一程程經歷中學習調

本文於 103.09.24 收稿，104.03.0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5.03.48.02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整，涵泳缺憾，生命遂得以日趨厚實；而文人園林也在走向私人天地的主流中，同時得以保有現世關懷和開放性格。

關鍵詞：杜甫、浣花草堂、倫理、文人園林、同谷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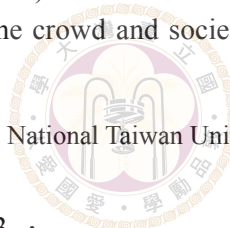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Du Fu's World of Ethics in Wan Hua Thatched Cottage

Tsao Shu-Ch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Du Fu's (712-770) world of ethics in his Wan Hua Thatched Cottage. The main body of this article includes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discusses the multifaceted meanings of the beginning of Du's wandering life: his escape from the capital. The second section investigates why Du constantly travels around rather than settles in Qinzhou or Tonggu. These two sections highlight the Wan Hua Thatched Cottage as a place of pause in his entire travel. Section three, the main part of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atched Cottage in Chengdu and its meaning of ethics. This section particularly depicts how Du establishes h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and rebuilds his relationship with human ethics and things in the world. Du builds the thatched cottage as a base for a new social position and vision of life, and the building becomes a new scene of Chengdu and a part of local history and memory because of his stay. Though Wan Hua Thatched Cottage is also a basic type of Tang dynasty literati garden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Wang Wei's (701?-761?) Wang River Villa and Bai Ju-Yi's (772-846) Lü Dao House Garden and Lu Shan Thatched Cottage keep a distance from the crowd and society, dilute the influenc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serve as an individual world of delight. They cause the garden designing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o evolve into a symbolic epitome of the universe in a pot. Du's cottage demonstrates a different state of mind, and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mpacts later scholars' attitudes toward living in garden houses. They are therefore able to accept various sufferings in reality, adjust themselves in changes, appreciate frustrations, and fulfill their lives. Later literati gardens also retain the openness and concerns about the secular world under the mainstream that features private space.

Keywords: Du Fu, Wan Hua Thatched Cottage, ethics, literati garden, Tonggu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杜甫浣花草堂倫理世界的重構

曹 淑 娟

一、前 言

安史之亂標誌了唐朝國勢盛衰的轉折，玄宗朝廷隱身於繁華背後的腐敗真相一一揭露，政綱隳壞，軍機誤判，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加以連年戰火，肅宗朝廷重整江山的工程龐雜艱難。杜甫自天寶五載結束壯遊歸返長安，完整見證了這場戰亂的前後發展。至德二載（757）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肅宗朝廷還京，杜甫亦攜家返回長安。但亂軍未靖，百姓殘於兵盜，中原仍為持續的戰亂和天災所掩覆。次年二月改元乾元，六月杜甫見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9），撰寫〈三吏〉、〈三別〉等詩作，反映了基層百姓在戰亂中的悲困境遇，以及承擔苦難的堅強韌性。那年初秋，饑饉遍於關輔諸地，他決定棄去華州司功參軍的官職，退出自己無從著力的官場走入民間，展開舉家飄泊的行程。在他的預想中，應未料及那一年的後半段歲月，竟會陷入如此巨大的窘困與不安之中。

乾元二年七月杜甫由華州前往秦州，應是棄官前已經評估的選擇，然只停留三月左右，於十月間離開秦州，攜家經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泥功山等崎嶇山川，抵達同谷。未久重又踏上旅途，艱難入蜀，歷經木皮鎮、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等地，飽嘗艱險苦寒，於歲暮抵達成都。¹ 陌生

¹ 杜甫〈發秦州〉系列紀行詩，見唐·杜甫著，清·楊倫編輯：《杜詩鏡詮》（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7，頁287-296。〈發同谷縣〉系列紀行詩，見《杜詩鏡詮》，卷7，頁301-310。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若無須另作說明，將隨文標示卷頁，

的異鄉暫時終止了他當年的漂泊，〈成都府〉抒寫悲欣交集之情，作為二十四首入蜀紀行詩的總結：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卷7，頁310-311）

對一位來自東方的遊子而言，成都這一異鄉展示了它新異的面貌，曾城華屋，歌舞昇平，富庶的山城景觀豐富，溫暖的天候養護了動植物以及生活其中的人民。人民之所以為「新」，除了陌生感，應還呼應著下文的「美」，包含對當地居民生活氛圍的整體感受，它不同於故鄉，也有異於秦州、同谷。成都此一陌生而美好的他鄉，似乎是他一路追尋而又屢尋未果的樂土。

是以杜甫懷抱「信美無與適」的哀傷，同時也有展開新生的喜悅。先是暫居於草堂寺，² 次年（上元元年760）春天，即在諸多親友的共同襄助之下開始籌劃營構草堂，暮春即已完成主體建築，隨即移居其中。後於寶應元年（762）7月避亂入梓，直至廣德2年（764）春嚴武復鎮蜀州時重返成都草堂，永泰元年（765）春、夏之間攜家東下，前後居留草堂三年餘，³ 成詩二百餘首，

不另作註，以避繁瑣。自秦州入蜀行程時日可參見簡錦松：〈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22期（2011年11月），頁75-96。

² 草堂寺，盧求《成都記》（敘於大中九年〔855〕）云：「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另宋人《成都記》：「草堂寺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極宏麗，有名僧履空居其中，杜員外居處逼近，常恣遊焉。」分見王文才、王炎編著：《蜀志類鈔》（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162、173。楊倫〈酬高使君相贈〉題下注引黃鶴注：「公初到成都寓浣花溪寺」，又引趙清獻《玉壘記》：「公寓沙門復空所居。」《杜詩鏡銓》，卷7，頁311。草堂寺應即浣花溪寺，履空、復空或因形近而誤。

³ 杜甫〈去蜀〉：「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乃略舉成數。《杜詩鏡銓》，卷12，頁563。

約古今存詩作五分之一。

學者研究杜甫草堂詩作，其日常生活面向獲得普遍關注，如方瑜先生指出「草堂卜居時期，杜甫往往以舒放自適的心態與自然相親相得，產生了許多詩酒自寬、明朗溫馨的作品，是草堂詩篇的一大特色。」⁴ 呂正惠先生論杜甫奠定了日常生活詩歌傳統的基礎，即多舉草堂詩作說明其題材與寫作意識。⁵ 李欣錫則標舉生活題材進行專研。⁶ 此外尚有關注詩人隱逸心態的討論，如孫永忠認為草堂時期的杜甫認同自我的隱逸狀態，從而開啟新的生命情趣。⁷ 蘇怡如則指出草堂時期杜甫在身分上仍是官員，其自我認知與定位也始終屬於仕宦場域，卻仍時以隱逸話語自我指涉，「正是在對於隱逸話語的繼承與逸離之間的罅隙中，杜甫真切呈現了自我生命的飄零無著與進退失據」。⁸ 另有由園林文學角度探索草堂的空間經營與後代重修情形，如侯迺慧引據草堂詩分析其自然景觀與觀景設計、簡樸的花木與建築、和樂活潑的動物園，稱之為「簡樸親切的生活園林」。⁹ 蘇怡如論述杜甫「隱逸空間之建構」時，對草堂是「一處文人化的市郊園林」亦有簡要分析。¹⁰ 許世榮留意及韋莊以後歷代重修杜甫草堂情形。¹¹ 其餘言其閒適心態、平和之象等文甚多，不遑一一舉證。這些相關

⁴ 方瑜：〈浣花溪畔草堂閒——論杜甫草堂時期的詩〉，《古典文學》第2期（1980年12月），頁153-182。

⁵ 呂正惠：〈杜詩與日常生活〉，《唐詩論文選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85年），頁285-297。

⁶ 李欣錫：《杜甫巴蜀詩「生活」題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陳文華、沈秋雄、蕭麗華先生指導，1999年6月）。

⁷ 孫永忠：〈愛花欲死杜陵狂——談隱逸為杜甫開啟新生命情趣〉，《輔仁國文學報》第27期（2008年10月），頁77-102。

⁸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臺師大《國文學報》53期（2013年6月），頁119-143。

⁹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第二章第二節，頁100-112。

¹⁰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

¹¹ 許世榮：〈論杜甫成都詩和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總第108期），頁47-54轉74。



論述都為瞭解杜甫與草堂提供十分豐富的資藉。

筆者近年觀察文人與所處空間的對應關係，好奇於文人在流動與安居之間如何安頓身心問題，留意及杜甫與浣花草堂的關係有二項突出的特質，其一，浣花草堂具有高度可替代性，成都並非杜甫之故鄉或舊園，如陶潛之柴桑，謝靈運之始寧別業；亦非生涯規劃中主動擇定之所，如王維之得輞川別業，白居易之購楊憑宅，李德裕之置平泉莊。浣花溪畔，是在「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卷7，頁301）流動過程中相逢的寄身之地，在當年漂泊的過程中，秦州的東柯谷、西枝村、同谷似也有可能作為「草堂」的基址，但是這些暫時棲身的處所，終究未充分經營出「草堂」的空間意義。相較之下，浣花草堂作為整體流動經驗一段停駐的里程，意義獲得較充分的實現。其二，杜甫此趟流動行程與其暫時離開官僚系統同步開展，不同於王維、白居易之在職中隱，在仕宦與園居之間取得和諧；略近於陶淵明之解印綬歸園田，然又未決然不問政事。杜甫帶著憂憤之情，攜帶長時被自己忽視的家眷，遠離京師奔赴陌生的他鄉尋求安居，呈現了一個失意儒生如何走過人倫關係崩毀的危機，企圖重構其儒家倫理世界的過程。筆者深覺此義仍有可再闡明之處，是以不揣淺陋，參酌既有的研究成果，重新細讀杜詩，結合棄官流離秦隴的過程，闡述杜甫浣花草堂的建構意義，它作為杜甫生命流動過程中的一段短暫寓居，同時也是他生命居留當下的全幅展現。

二、漂泊的開始：杜甫棄官離京的多重性意涵

乾元二年（759）初秋，杜甫棄去華州司功參軍的官職，那年饑饉遍於關輔諸地，杜甫不計溫飽，帶著見疏被貶的遺憾¹²棄官去職，並遠離京師，可

¹² 簡錦松先生指出對於杜甫而言，出任華州司功參軍等於是貶謫，是以杜甫入蜀後仍喜歡自稱拾遺，喜談左拾遺往事，但恥於重提華州司功參軍經歷。氏著：〈杜甫夔州生活新證〉，收錄於謝海平主編：《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11月），頁117-162。

謂一生重大的轉折性決定。¹³ 它飽含詩人複雜糾結的心緒，具有幾重意涵：

其一、人生方向的修正與轉折：

杜甫自青壯年時期，南遊吳越，北遊齊趙，從遺跡的參訪中重新審視歷史進行評價，也快意裘馬，結交名士，為進入仕途作準備。在先後兩度考試失敗後，決意留守長安，京城內有豐富的社交活動，文士在此可以學習、融入京城流行的文學趣味與批評尺度，進而追求包括政治精英的京城讀者的認可。¹⁴ 杜甫曾得到部分意見領袖的欣賞，也曾獻三大禮賦，獲得玄宗青睞，待詔集賢殿。¹⁵ 但是在具體生活的安排上，則是奔走於權勢富貴之門，努力參與各種公共活動，爭取被看見、受肯定的機會，反身自照，不免對現實處境生發困惑，有蒼茫悲辛的感慨。¹⁶

杜甫終究沒有放棄等待入仕機會，他以王者師稷、契自比，期許自己有所作為，輔佐玄宗成就堯舜事業，安撫百姓生活，完成政治理想與社會實踐。縱使此一自我定位與理想實現遙遙無期，但他本著堅強意志力，相信自己入仕求用的人生方向是不可能改變的，一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自京赴

¹³ 廖美玉先生〈漫遊與漂泊——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一文，觀察杜甫青壯時期的漫遊吳越、齊趙，及垂暮之年的漂泊東川與兩湖，分別論述詩人的生命版圖與城市印記的交互映現、昔賢遺跡與窮山惡水的雙軸書寫，論述十分深刻。文中所觀察之漂泊雖不包括成都時期，然所言流離所造成的距離，乃能以自外於京城的姿態，取得獨立書寫空間，實亦適用於成都時期的杜甫。《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年12月），頁225-266。

¹⁴ 此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論初、盛唐詩時已然標舉，他討論王維、張九齡、孟浩然等第一代京城詩人，元結、杜甫等第二代京城詩人，以及李頎、王昌齡、李白等引入京城詩的新趣味等，都論及京城社交與文學的關係。參見氏著，賈晉華譯：《初唐詩》、《盛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

¹⁵ 杜甫〈壯遊〉：「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體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杜詩鏡銓》，卷14，頁699。

¹⁶ 長安時期詩作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樂遊園歌〉：「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杜詩鏡銓》，卷1，頁25；卷2，頁44。

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卷3，頁109）。

天寶十四載杜甫方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旋即安史亂起，玄宗奔蜀，他困陷長安數月後奔謁肅宗，得授左拾遺，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次年七月棄官。杜甫真正的仕宦經驗為肅宗朝廷三年，若從玄宗朝初獲官職算起，前後亦不過五年，相較於前此數十年的準備與等待何其短暫。此度棄官與原先堅持的葵藿之性、入仕之志是否衝突？縱使未全面否決昔日的選擇與堅持，也是自我有意的重作觀省與修正，心境想必十分艱難矛盾。

其二、對民間力量的認識和肯定：

長安等待時期，杜甫思考自己的去留問題，也曾設想退隱在野的生活，但彼時杜甫尚無法超越入仕求用的價值取向，尚無法深入體會退出政治場域的人生意義將要如何安放。

安史亂起，參與肅宗朝廷的具體從政經驗，時間雖然短暫，卻有豐富的體驗，曾經以敝衣麻鞋千里奔謁感動天子，熱血地盡職言事，也因疏救房琯，很快地被摒除在遙遠距離之外，只能「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曲江二首》之一，卷4，頁180），旁觀中興氣象裏潛藏的衰頹與不安。這些昔日未嘗預料的際遇和感受，提供了更多元角度思考，讓他終於可以鬆動入仕的堅持。

杜甫的人生視野和生命體驗也在這幾年獲得大幅的拓展和深化，在亂世的苦難裏，詩人看到了廣大沈默的百姓遭受到的深重傷害，同時也體認到了這些受難百姓的強韌生命力，《三吏》、《三別》等詩作不只描述出家庭的崩毀、掩抑的哭聲，也透顯出悲愴百姓如大地般承載苦難、修復瘡痍的沈厚力道。這種民間力量的認識，也作用在杜甫自身對存在處境的回應，在亂後新朝的現實格局中，既與肅宗朝廷疏隔，杜甫收拾自我用世之心，以理想志業託付朝廷之士，轉而追尋在野生命的自發義行與自用風姿。¹⁷

¹⁷ 杜甫晚年於夔州作《壯遊》（卷14，頁696-701）詩，曾回顧當年棄官西行心境，固有「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個人壯心消磨的嘆息，也有「吾觀鷗夷子，才格

棄官前的〈獨酌成詩〉云「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卷4，頁155），野人可兼指兵戈擾攘中的百姓，以及昔日那懷抱素樸理想的自己，杜甫對於自己廁身官場卻無能陳力就列深懷愧疚，既無助於苦難中的百姓，也違背於少壯的理想。是以杜甫的轉身離開，雖非全然出於主動的選擇，但也不止於消極的黯然被棄，其中隱含有士人的自覺。薩依德在《知識分子論》指出：當士人參與社會政經文化活動的機會增加時，為了避免成為各種權利結構的一員，惟有轉身離開而以「業餘者」、「圈外人」的身分，才得以「保有足夠的自由去成長、改變心意、發現新事物、重新發現一度擱在一旁的東西」。¹⁸ 杜甫的棄官西行，還蘊蓄著轉生新意義的可能。

其三、對於家庭倫理位置的回歸：

縱觀杜甫詩集，亂事未起之前，家人的身影稀疏而模糊，在旺盛的自我意識之前，妻子兒女尤其姿容隱淡、聲音低微。

在原生家庭裏，杜甫早熟獨立，母親早逝，就養於二姑。父親杜閒曾官至兗州司馬、奉天縣令，杜甫未隨父赴任，在成長過程中，與繼母盧氏、異母弟妹似無親密的共同生活經驗，詩人詩中未曾言及盧氏，與異母弟妹的血親之感則在亂起後得到加強。青壯年時期南遊吳越，北遊齊趙，杜甫遨遊於山川、歷史、社群的萬里開闊場景，快意十餘年，未見家族的牽繫，形軀與精神的伴侶都是朋友，不是家人。

居留長安時期，杜甫曳裾豪門，等待入仕機會，妻兒多寄寓於城外偏鄉，家庭生活中「父親」的角色往往闕如。如天寶十四載歲末返家探視，杜甫始知

出尋常。群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的期待。此外，他的系列鷺鳥主題的詩詠，也彰顯出人生實踐過程的修正與調適，經歷亂後，贊歎在野鷺鳥的自發義行與自用風姿，反映出對民間力量的重新體認與棄官退守的心境。請參見曹淑娟：〈從杜詩鷺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淡江中文學報》3期改版（1996年12月），頁113-144。

¹⁸（美）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159。



幼子夭折：「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卷3，頁111）。杜甫或許不是完全不負責任的父親，應有安置妻兒經濟的安排，只是他發現自己低估了民間生活的困難、養兒育女的艱辛，也不能體貼妻子獨力支撐一個家的沉重身心負荷。入門之際，號咷聲起，既是對小生命遽爾消逝的悲痛，也是這個家對男主人發出返家參與的召喚。

適因安史亂起，杜甫得以家居數月，攜家流寓於鄜州羌村避難。八月奔赴肅宗行在靈武，途中為叛軍所俘，押至長安，後冒死奔赴鳳翔謁見肅宗。此番離家，又與家人有年餘的睽隔。期間詩人顯露了較多的對妻兒弟妹的溫柔關懷，〈月夜〉、〈春望〉、〈述懷〉、〈元日寄韋氏妹〉、〈得舍弟消息二首〉、〈憶幼子〉等都進入了書寫範疇，杜甫學習了表達出對家人的感情。

至德二載秋，杜甫得以返回羌村，亂離中生死一線，重逢恍惚如夢，卻也是大量死亡的時代環境中最具體的幸福。所以〈奉先詠懷〉中只在「入門聞號咷」以聲音出場的妻兒，〈羌村〉中有了「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卷4，頁158）的具體形象和動作。〈北征〉（卷4，頁159-163）更以家庭生活的描寫與返鄉途程、時代感懷並列，各占三分之一篇幅。首段敘述由鳳翔返鄜州所見所思，寫遍佈死亡印記的大地；後段寫對肅宗中興事功的提醒與期望；安置在二段之間的，是返歸家庭生活亦愁亦喜的素描。

杜甫不辭瑣細，以十八聯詩句列舉妻兒對自己歸來的反應及改變。由於男主人的歸來，以及行囊中細心地帶回了粉黛與衾裯，二者是親密關係中常用以致贈女性的禮物。¹⁹於是，原來衣衫百結、哭聲迴蕩的老妻，臉上重新映現了

¹⁹ 閻云翔以人類學的角度，在黑龍江下岬村從事實地田野調查，觀察到非儀式性情境中的表達性禮物饋贈，在已有婚約的男女之間贈送的私人禮物，男性常常選擇新衣服和化妝品，可見古今的相似性。閻云翔著，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64。

光彩；面色蒼白的兒女，也由羞怯畏生、襤褸垢膩，很快地與父親親熟，好奇活潑而且調皮；尤其兩個小女兒特寫鏡頭的轉換令人印象深刻：父親未歸，她們身上穿著迭經補綻的衣著，舊繡曲折顛倒；父親既歸，她們臉上塗抹脂粉，朱黛並施，筆畫狼藉。可悲可喜之狀在短時間內快速轉換，在詩人筆下笑淚一時並見，呈現悲愁中平易的幸福。重要的訊息是：他們有了改變，詩人明確地感覺到自己對家可以有所貢獻，是那有能力「救汝寒凜慄」的救援者。

「救」字的使用不免帶有外來施捨的意味，恰好反映杜甫不是家庭的長駐者。但杜甫此度返家，顯然已努力要扮演歷來最稱職的丈夫與父親角色，也對於亂世中親情的價值別有體會。不久後書寫亂世所見，也才會有〈三別〉選取年輕人的〈新婚別〉、年長者的〈垂老別〉以及完全被剝奪倫理親情者的〈無家別〉的情境設定。其後杜甫很快為肅宗所疏遠，出為華州司功，往來於華州與兩京之間，對妻兒而言，他依然常常是不在場的丈夫與父親。

對棄官前的杜甫而言，家庭大多時候是一個虛懸的空間，他的人生意義直接建立在置身社群邦國的意義上。如果說，杜甫承認「無力正乾坤」而棄官，攜妻兒與幼弟西行，是對之前認取入仕生涯的轉向，它同時也代表著：詩人重新進入家庭空間之中，認取自己與家人的緊密關係，願意承擔起家庭責任並參與其中生發的苦樂，於是家庭、親族介入了個人和邦國的聯繫網絡之間，杜甫首度全職地扮演為人夫、人父、人兄的角色，只是，困難度遠超過預期的想像。

三、流動的過程：杜甫何以不能安居秦州、同谷？

由秦州往同谷，再由同谷入蜀，杜甫有兩系列紀行詩書寫行程所見所感，並寄寓人生行道艱難之隱喻。²⁰ 此數月間寓居秦隴荒山的地方經驗，則存有〈秦州雜詩二十首〉、〈即事〉、〈遣懷〉、〈野望〉、〈空囊〉、〈乾元中

²⁰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中的「人生」隱喻〉，《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1-39。



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等作可供觀察。²¹ 下文嘗試從數端進行論析：追尋樂土與終成絕境的斷裂感受、迥異日常的時空感、自我價值與人倫關係的逐步失落，以見其驅迫於途不得安居的無奈。

(一) 追尋樂土與終成絕境的斷裂感受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秦州、同谷雖為不同的地點，但在杜甫移居的過程中，卻讓他一再面對想像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先是因關中久旱大饑，杜甫離開長期作為意義中心的京城，期望新生活的展開。初時寄居城內，積極尋找可以隱居安家之處，曾經邀贊公陪同前往西枝村尋置草堂地未果，又聽說東柯谷和西谷都有可居處，心中十分嚮往。²² 如對東柯谷的美好想望：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十三，卷6，頁244）

想像裏，東柯谷藤蘿蓋瓦，水竹相映，風光純淨，土地亦堪耕種，居民應過著桃花源般的生活吧！族姪杜佐有草堂在東柯谷，召喚了杜甫卜居東柯的心願。但是桃花源般的生活終究未曾實現，無論杜甫一家是否遷入東柯谷，寓居杜佐提供之草堂，²³ 處境依然困乏。在天寒無衣、囊空乏食的困窘中，杜甫聽聞了

²¹ 秦州三月存詩較富，楊倫《杜詩鏡銓》卷6編集「乾元中公客秦州作」，凡45題，頁239-286。同谷棲止，詩人只有〈鳳凰臺〉、〈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萬丈潭〉以及啟程赴蜀的〈發同谷縣〉等相關詩作，《杜詩鏡銓》，卷7，頁295-301。

²² 西枝村、東柯谷和西谷所指之地，歷來注解頗有出入，陳貽焮先生對此作過詳細討論，認為東柯山在秦州南六十里，山麓即古西枝村。東柯、西枝並列，西枝村當在東柯山谷之內而別是一村。故杜詩中統而言之稱「東柯」、「東柯村」，具體指所訪之村就說「西枝村」。至於傳聞中的西谷可能指同谷，然仍非定論。請參見氏著：《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中卷，頁503-522。

²³ 傳統注解如仇兆鰲、楊倫等多認為杜甫確曾移居東柯谷杜佐草堂，然陳貽焮先生懷疑杜甫一直住在秦州城內，謀居東柯谷未成。同前註。若果如此，詩人在秦州先後卜居東柯谷、西枝村、西谷俱未成，更不得不另作他圖。

位在秦州西南方的同谷，地理條件相對優越，因此決定趁秋冬初交移居同谷。

〈發秦州〉詩直陳了重新燃起的美好期待：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
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密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谿谷無異名，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
日色隱孤樹，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卷7，頁287-288）

前段寫對同谷的期待，中寫秦州不可久留的因素，後寫日夜兼程奔赴同谷。想望中，同谷氣候溫和，可以緩解冬衣不足的焦慮，況且聽說山川幽美，物產豐饒。「同谷」、「栗亭」的地名也讓杜甫望文生義，谷地水土豐美、地氣和暖，栗亭下有良田、多產食糧，再加上天然野生食物可供採掘，誠為值得期待的南方樂土。因此杜甫帶領家人跋涉二百六十五里崎嶇山川，追尋樂土而來。

未料抵達同谷，樂土迥出望外，短期的居留，詩人便決定與它作別，在寒冬踏上另一段旅程。〈發同谷縣〉適可與〈發秦州〉詩參看：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
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
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遯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卷7，頁301）

杜甫解說自己何以要再捨同谷而去他方，並且就在冬寒酷烈中啟程遠行，「絕境」是他在具體接觸、生活其中後，給予同谷的新稱謂。對於同谷不是沒有感

情，「停驂龍潭雲」數句，再度回顧空間地景，與在地父老落淚道別，同谷生活中亦有某些值得珍惜的因素，只是它們敵不過更龐大的「絕境」感受。此一「絕境」感受，正是〈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企圖呈現的詩境，下文將有所析論。

（二）迥異日常的時空體驗

詩人之秦州、同谷詩篇每每營造有別於日常生活之奇異景象。川合康三先生即指出〈秦州雜詩二十首〉中，多處頷、頸聯之對偶詩句，往往鋪陳出一種特殊氛圍的情境。他揀列出如下數聯：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其一，卷6，頁239）

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其二，卷6，頁240）

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其四，卷6，頁240）

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其七，卷6，頁242）

魚龍水和鳥鼠山都是秦州地名，相傳汧水出小隴山，東北深淵中有五色魚被稱為龍，故名魚龍水；鳥鼠山則典出於《尚書》、《水經注》、《爾雅》，源於鳥鼠同穴的傳說。京師來的詩人面對秋季裏岑寂陌生的山野，在地名符號的引導下，進入到有別於日常的傳承自古老傳說的異質世界，想像著水位漸低的河川和木葉漸脫的山谷裏，彷彿有某些生命隱隱蠕動著。「月明垂葉露」凝集於秋葉尖端一粒將落未落的露珠，時間靜止於瞬間，而露珠上映現著晶瑩的月光，那月光正無分別性地普照於萬物全體，於是，幾乎將空間與時間的世界全體凝縮於露的一粒之中，然而此露即將墜落迸裂，全體時空似也懸繫於此一動靜交際的一瞬。「雲逐度溪風」藉由倒裝句法改變了現實中雲和風的關係，賦予雲能動性，「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同樣勾勒迥異於日常經驗的現象，製造不安的非現實感。「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二句，詩人截取秋蟬聲嘶力竭無聲的一霎，以及失群孤鳥不知何處落腳的猶豫剎那，失聲、失速的靜止，鋪染著生命力低微乃至結束的狀態。川合先生細膩地詮釋詩句的組成與意涵，並指出這些特異的敘景表現和一般的實景再現不同，創造出了與現實異質的光

景，應也是詩人內心的深刻投影。²⁴並引述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言「水落」、「無風」等詩句「新しい自然を、みずからによつて能動的に造型する」（將新的自然塑造成自體能動的形態），指出它們超越目視世界的既存認識，將觸手伸入人的認識無法到達的邊界。²⁵

將心象風景化，²⁶詩篇反映了杜甫心境的不安，這份不安由秦州蔓延向同谷，〈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²⁷是杜甫唯一一組正面描述同谷生活的詩作，以日後未曾再重複的七歌形式，訴說生活其地的「絕境」感受，可分從時空兩方面分析。

在時間方面，〈同谷七歌〉中杜甫有意削弱了同谷經驗裏時間的流動性，凝塑出幾近停滯的時間感。杜甫寓居同谷正值寒冬十一月，秋季已去，春日尚遠，未逢季節交替的轉換，同谷生活的季節性變化原即不明顯，時間好像就停滯在冰雪寒凍的隆冬裏，移步艱難。至於日常生活的時間性呢？杜甫筆下也傾向凝定靜止，並未展開生活事件的線性敘述。連章詩中共出現二個具體時間點，一是「日暮」，一是「中夜」。前者代表身體勞作時間，出現在「天寒日暮山谷裏」〈其一〉，暮色已攏，總結種種揀拾栗實、掘鋤黃獨等維生的努力，而成果貧乏，時間都成虛耗；後者代表思惟感受時間，出現在「中夜起坐萬感集」〈其五〉，夜半省思當前處境的意義，而僅餘悲感，並無在地改變的希望。「日暮」與「中夜」只是以二個短暫的時間段落散置於詩行中，第一章和第五

²⁴ 川合康三先生〈漂泊の旅暮らし—成都まで〉文中論述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呈現之「不氣な味風景」，分析十分細膩深刻，請參見氏著：《杜甫》（東京：岩波書店，2012年），頁117-128。此段行文主要即參酌川合先生之論述進行約取譯寫，不敢掠美，謹此說明。

²⁵ 同前註，頁124。

²⁶ 宇文所安先生亦指出〈秦州雜詩二十首〉描述秦州成為「北」的類型標誌：陰暗、潮濕及孤獨，是複雜的心理狀態的標誌。（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頁302。

²⁷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杜詩鏡詮》，卷7，頁296-299。下文引述簡稱〈同谷七歌〉，不再標示卷頁。

章遙遙相隔，詩行的距離也阻斷了二者之間人事的因果聯繫與先後流動性，只呈現二個凝定的時間橫剖面。²⁸

文本中的時間幾近停滯，真實生活中的時間依然流逝，只是以日復一日、時時刻刻重複而無變化的樣態堆疊持續，沒有個別的時間特質，整體同谷時間面目單一而模糊。所以七歌不必是同日之作，所記情感與活動亦不專屬某日，「此時與子空歸來」〈其二〉，與「天寒日暮山谷裏」〈其一〉同樣重複著維生努力的失敗與無奈，「中夜」的起坐徬徨也不是某一夜晚的個別特例，而更傾向於無特定性的常態。筆者認為：題目以模糊的「乾元中」代替具體的時間指陳，可以說也反映出相同的心態。²⁹

在空間方面，〈同谷七歌〉勾勒杜甫一幅幅風景化的心象。較諸秦州雜詩，更傳遞出一份「反常為常」的悲情。詩中的景物描寫可大別為兩組，其一是實寫為主的寒冬同谷景象，如「黃獨無苗山雪盛」（其二）、「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其五），同谷四方多山，雲霾不開，自成一封閉的世界；其中天寒雪盛，斷絕了居民可以維生的野生資糧；兼以多風多雨，溪急樹枯，古城荒涼，禽獸出沒。在詩句描寫

²⁸ 其他詩篇雖也出現少數時間用語，〈其四〉「十年不見來何時」之「十年」，指與韋氏妹之長期睽違；「林猿為我啼清晝」之「清晝」，鋪陳整體時空環境之悲感；〈其六〉「溪壑為我迴春姿」之「春姿」，為想像中渴望召來突破現況的春天；它們都不是陳述現實時間之流。

²⁹ 〈同谷七歌〉主題為乾元二年十一月寓居同谷而作，並無疑義。然寫作時地則存異說，歷來讀者多視為滯居同谷時期所作，仇兆鰲、楊倫編排〈同谷七歌〉於〈發秦州〉與〈發同谷〉二系列紀行詩之間，亦是視為該年之作。劉孟伉於《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年）亦繫於此時，然晚年有遺作〈讀詩小記——〈同谷七歌〉的時間和地點問題質疑〉，《文史雜誌》1985年2期，頁20。以〈長沙送李十一銜〉詩為旁證，認為是大曆五年秋天追憶同谷情況的補作，創作地點在湖南長沙，前六章說當年寓居同谷之事，後一章則言補寫此詩之事。蒲向明亦以「凡言某某年中，都是後追前之詞」，推測可能是離開隴南後追憶當時情況的補作，見〈論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1期（2009年2月），頁25。唯劉、蒲二文仍屬推測，尚乏確證，筆者仍視之為同谷後期困窘至極，萌念他去之時所作。

中，原應生命力強盛的野生植物今卻發不出新苗，原應在野外活動的狐狸卻出入民居，原應滋潤生機的雨水卻在草木黃枯之後才灑灌其上，杜甫以種種失常景象鋪寫眼中的「窮谷」。其二則為創造出的狂想性畫面，渲染著胸中之怫鬱。如「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鴦後鷺鷥，安得送我置汝旁」（其三），當時穎、觀、豐三弟懸隔他鄉，亂事仍未平定，杜甫想像彼此間距的畫面，在胡塵暗天的背景裏，卻奇異地出現了前後飛翔的鴛鴦、鷺鷥等大鳥，寄託「假翼飛鳥」³⁰ 兄弟相會的想望。「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其四）則想像與韋氏妹間的阻絕，憤怒的蛟龍翻滾起洶湧的波濤，戰火瀰漫中箭矢交織，處處潛伏傷害。「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巖從枝相繆。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其六）借同谷東南萬丈潭（亦名飛龍峽）有龍飛出之傳說起興，想像深潭中古木枝幹糾葛、木葉黃落，潛龍蟄伏未起，而蝮蛇外來入侵、肆意悠遊。這些超越現實的景像鋪寫，反映了杜甫在窮谷中躁動不安的心魂。

（三）自我價值與人倫關係的逐步失落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秦州雜詩〉二十，卷 6，頁 247）詩人收回了致君堯舜的自許，自居平凡百姓，學習與家人一起經營家庭生活，也學習調整自我在人倫網絡中的重心位置。

秦州時期，杜甫仍有社交生活，除了提供草堂的親族杜佐，也有在地分享者如阮隱居，與從京中大雲寺謫此安頓的方外道友贊公結交，並與京師故交高適、岑參、薛據、畢曜等有詩書往來，³¹ 身心俱不至孤絕。及至同谷，則進入

³⁰ 「假翼飛鳥」用楊倫語，《杜詩鏡銓》，卷 7，頁 297。

³¹ 參見〈宿贊公房〉、〈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寄贊上人〉、〈示姪佐〉、〈佐還山後寄三首〉、〈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秦州見數目，薛三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等詩，皆可見杜甫在秦州之交遊，是以〈發秦州〉亦云：「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諸詩見《杜詩鏡銓》，卷 6，頁 248-251、266-278；卷 7，頁 287。

了幽居的狀態，由今日存詩看來，杜甫與京師故交一時斷了聯繫，與當地父老交情未深，既無親族可依，也無贊公等人物可以談論心跡，僅有「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其七），是唯一記及的社交活動。³²君臣、朋友二倫陷入前所未有的虛無之中，首度全職地扮演人夫、人父、人兄的角色，回歸家庭倫理位置。但是，杜甫也在這一月生活中體驗了自我價值與人倫關係失落的焦慮。茲從三端略作論析：

1. 部分自我的死亡：

衣食作為日常生活所需，杜甫既因「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來到同谷，對之抱持高度期望，抵達之後，卻很快發現一切迥出望外。同谷或許比秦州溫暖，但時值仲冬，它依然冷寒徹骨，頂風冒雪在山谷中蒐尋食物，以致「手腳凍皴皮肉死」（其一）。身體具體感知寒冷帶來的挑戰，皮膚皺折、脫皮、龜裂、出血、壞死，傷害由皮膚表層往皮肉組織內部滲透，由四肢末梢向身體軀幹侵蝕蔓延，疼痛感亦由形軀而進入心理，而杜甫對之束手無策，只能無奈看著局部皮肉組織的壞死，看著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無能，彷彿看著部分自我的死亡。

飢與寒並作，預想中同谷土地提供了豐饒的物產，薯蕷、崖蜜、冬筍等可輕易取得。然而實際面對的情況是：「長鑱長鑿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其二），杜甫既未擁有耕地，短期內亦不可能自耕自足，只能仰賴山野自生的糧食。大雪覆蓋的田野，食物或者已為他人先得，或者雪深難尋，他只能以凍傷的身軀緊握冷硬的長鑱，更加努力找尋。但是託以為命的長鑱並不具有創生的能力，既不能創造糧食，也不能幫忙引導

³² 〈同谷七歌〉之七，《杜詩鏡銓》，卷7，頁299。浦起龍考查出此一舊交姓名李銜，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9年），頁264。詩人晚年有〈長沙送李十一銜〉云：「與子避地西康州」，即指同谷。《杜詩鏡銓》，卷20，頁1030。另在由秦州往同谷之紀行系列〈積草嶺〉言及「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杜詩鏡銓》，卷7，頁294。主人似指同谷宰。然數人能提供之支持力量恐亦甚微，無能解除杜甫的困境。此外，曾道經兩當吳郁故宅，作〈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是同谷時期唯一記及僚友之作，然詩人過其空宅，思及往事，並未取得聯繫。《杜詩鏡銓》，卷6，頁284-286。

糧食之所在。杜甫束手無策，只能無奈接受飢餓的狀態，家人也一樣接受飢餓的折磨。杜甫與同谷地理空間相遇，飢與寒作為最巨大強烈的體驗，也由此決定了杜甫同谷經驗的悲情基調。

2. 家庭親族世界的匱缺

人的存在意義還建立在與其他個體的關係上，夫妻、親子、兄弟姊妹構成家族人倫網絡，從而構成了家屋、家園的空間範疇。杜甫在同谷的空間體認，由自己的飢寒經驗往外擴充及於家人，他原應是家中生產力來源，卻對同谷的凍寒乏糧一籌莫展。當暮色收攏，徒然荷著長鑿歸來，卻不能帶回足夠的糧食，詩中未直接描寫自己的手足無措或家人的抱怨指責，只是呈現一同體受的飢寒：「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其二）。原本應該充滿溫馨快樂的家屋，籠罩在暗雲、寒風、溼雨之中，沒有小兒女的笑語燈前，只傳盪著飢寒交迫下壓抑不住的呻吟之聲，更反襯了一片冷肅靜寂，這是一個失溫、失色、失聲的家庭。

小家庭如此，擴大些的家族呢？杜甫有弟四人：穎、觀、豐、占，此時只有小弟杜占同行，其他三人各在他郡，輾轉不得相見，所以言「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其三）另有韋氏妹孀居撫孤，卻已多年睽隔，故嘆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其四）中國傳統家族凝聚力強，往往聚居鄉邑，守望相助。杜甫身為長兄，無力凝聚家族，遑論照顧，弟妹人各一方，家園空間遂也破碎支離，迸散在冥漠的天壤間，而自己困居同谷，與弟妹杳杳懸隔，生作異鄉之人，恐成異鄉之鬼。

3. 社群邦國世界的失落

杜甫來居同谷，缺乏與外界聯繫的管道，無從獲得政治軍事之明確消息，筆下涉及家國現況，不復秦州詩尚有實景觸發，而率皆出以想像，如前文所論狂想性畫面的創造。「胡塵暗天道路長」、「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家族因為干戈擾攘而加大了距離，漫漫長路中佈滿了戰火煙硝，邦國世界的動盪影像呼之欲出。



杜甫終究沒有正面描述邦國世界的圖像，而出以隱晦的比興手法，〈其六〉在後人的詮解中，即多讀出「慨世」之意，浦起龍云：「七歌總是身世之感，何容無慨世一詩。值亂乃作客之由也，不敢直斥五位，故借南湫之龍為比。」³³同谷東南有萬丈潭，俗傳有龍自潭飛出，³⁴詩借此以起興：「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詩句所指，若以譬喻修辭理解，歷來尚存歧義，或以龍蟄指唐朝君主，蝮蛇指安史餘黨；或以龍蟄指玄宗幽居南內，蝮蛇指跋扈之李輔國。³⁵安史禍害全民，李輔國擅權朝政，都是詩人親身經歷的時事，唯詩人未必拘執比法。筆者認同仇兆鰲之注文，更能說明詩人藉由龍蟄蛇行的幻想喚起邦國失序的投影，仇云：「神龍蟄伏，而蝮蛇肆行，此陽微陰勝之象。拔劍且休，誅之不勝誅也。溪壑迴春，蓋望陽長陰消，回造化於指日，其所慨於身世者，大矣。」³⁶君子/小人、政統/亂兵、希望/絕望，在邦國的世界裏彼此糾結、相互投影，一片危疑不安，詩人「拔劍欲斬」，主觀意志欲有所突破建樹，可以令寒沍枯寂的溪壑迴春。³⁷但它終

³³ 浦起龍：《讀杜心解》，頁264。另如明·單復云：「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正也。」《讀杜詩愚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影印明宣德九年江陰朱氏刊本），頁482。吳瞻泰云：「五六兩章皆思國事，乃隱而不露，而若為序谷中景物者，正其苦心經營處。」清·吳瞻泰：《杜詩提要》（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影印清乾隆間羅挺刊山雨樓藏板），卷5，頁299。

³⁴ 仇兆鰲注〈萬丈潭〉引《方輿勝覽》，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8，頁701。

³⁵ 前者如浦起龍云：「龍在山湫，君當厄運也。……蝮蛇東來，史孽寇逼也。」同註64。後者如錢注引吳若本注云：「此篇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載至自蜀，居興慶宮，謂之南內。明年改元乾元，時持盈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候其隙間之，故上元二年，帝遷西內。」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注：《杜詩錢注》（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卷3，頁166。

³⁶ 仇兆鰲：《杜詩詳註》，卷8，頁698。

³⁷ 方瑜先生指出：「（〈同谷七歌〉）詩中景物充滿複雜多歧的蘊義，決非眼前實景的單純摹寫，但又與現實景物相關」，並特別聚焦於第六章的春回意象，乃以詩思躍出現實時間之流，以詩筆召喚春天，從生命困境中突圍而出，構思甚具創意。〈困境與突圍——以杜甫〈同谷七歌〉與〈秋興八首〉中的春意象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9期（2008年11月），頁127-147。

究只是個人想望中偶然迸現的幻景，詩人分明體察客觀情勢的無能為力，「且復休」的罷手，不就是數月前之所以棄官的無能為力感？而今在同谷的地景映照中，詩人依然無可逃遁地深深陷落在「無力正乾坤」³⁸的困境。

〈同谷七歌〉裏，杜甫為自己勾勒的存在空間，首度完整地建構起由自我到家庭、親族、邦國的層次次第，同時也在此重層世界中，發現自我存在意義幾乎遭遇全面的挑戰甚至否定，至此生機斷滅欲盡。³⁹在此一危機意識下，毅然決定暮冬遠行，〈發同谷縣〉以「絕境」稱同谷，杜甫要努力尋求新生，不僅要重新選擇未來居處的地理環境，也要重新建立自己和重層世界的關係，賦予意義。入蜀後大量詩作書寫營構草堂與家庭生活，須與〈同谷七歌〉對讀，更能見其經營新生的努力與喜悅。

四、浣花草堂的建構及其倫理實踐意涵

杜甫建設浣花溪草堂，不止作為可以遮風避雨的住宅，更依之展開與草木蟲鳥、在地人事豐富的應接活動。方其暫離成都前往梓州時曾云：「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⁴⁰指出了草堂經營是一樁持續的工程，亦即前此二年餘的居住期同時也都是經營期。成都亂定，他從梓州重返草堂還有一年左右的居止，它們都是杜甫自覺的「經營」草堂時期。這樣的草堂「經營」概念裏包蘊著哪些內涵？杜甫雖無專文說明，然其大量詩篇實留存了豐富訊息，值得進一步加以梳理。下文分從家園要素的匯集與成型、「民

³⁸ 此用〈宿江邊閣〉詩句，《杜詩鏡銓》，卷13，頁654。〈宿江邊閣〉雖為入蜀後詩作，然反映的心境實可追溯肅宗朝的仕宦經驗。

³⁹ 「斷滅欲盡」用艾千子語：「如海外奇香，風相嚙，斷滅欲盡，獨留真液，公七歌足以當之。」《杜詩鏡銓》，卷7，頁299。原意似傾向詩風之評論，筆者深覺〈同谷七歌〉創體根源在於詩人對當時情境之深刻體驗，是以挪借以言當時生命情境。

⁴⁰ 杜甫：〈寄題江外草堂〉，《杜詩鏡銓》，卷10，頁452-453。原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胞物與」襟懷的生活實踐、社群關係與詩人身份進行論述。

(一) 家園要素的匯集與成型

上元元年春，杜甫在諸多親友幫助下卜居浣花溪畔，占地約一畝，相較於前此屢尋草堂地而未果，此度草堂基址十分快速且順利地確定下來，〈卜居〉詩云：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鸕鶿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卷7，頁312-313)

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主人應指劍南節度使裴冕，⁴¹ 杜甫在浣花溪畔得一畝之地，開始經營家園。草堂整體基地先天條件頗佳，就後起造園理論分析，是一處理想的園林基址。⁴² 地處郊區，原即多有林木禽鳥昆蟲等自然野趣；去城不數里，而往來可以任意；有南北鄰居野老，可以隔籬對酒，共話桑麻；浣花溪迂迴流過，提供實用與審美的多重效益；四圍多山，縱目所及，不難挹取山景。主人憑水借山，不須多費工程，只要留意方位取景，即可充分利用天然資源。觀其〈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卷8，頁342）、〈絕句四首〉之三：「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卷12，頁560）等詩句，可見對於山水借景之勝是頗為自覺的，能隨地勢之高下、面向之正偏，選址立基，開軒安亭，佈列植栽，招來禽鳥。杜甫以其窮困，缺

⁴¹ 舊注如黃鶴、鮑欽止多主劍南節度使裴冕為杜甫卜成都草堂以居之，然仇兆鰲認為無據，主張「主人」為杜甫自調。《杜詩詳註》，卷9，頁729。陳貽焮先生衡量諸說，仍評斷「主人」應指裴冕，亦因裴冕關係遂有諸多官員相助。請參見《杜甫評傳》中卷，頁642-643。

⁴² 明代造園家計成著有《園冶》，是中國早期較具系統性之園林專書，書中論「相地」，指出幾種不同地勢園基：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請參明·計成著，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頁38-55。杜甫草堂在成都城郊，浣花溪畔，鄰近村莊，整體環境可謂兼得村莊、郊野、江湖地之數種優勢。

乏多餘的資源從事奢侈的、裝飾性的建置，反而更能突顯出當時園林在貴族顯宦之外的清新走向。⁴³

茅草葺頂的草堂作為主體建築，規制簡樸，環以簡單的圍籬與柴門，提供杜甫一家可以遮風避雨的家屋，也是整個家園的意義中心，它在暮春時節即已建成，〈堂成〉一詩云：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卷7，頁315-316)

標題〈堂成〉取狹義草堂之意，然吟詠所及則是廣義家園的概念，從多元層面抒發感受：首聯略言建築物的地理位置及形制，緣江路熟透露逐漸生發的歸依感，頷聯寫整體家園中的植栽及其帶來的美感，頸聯寫家園中之鳥飛燕語表達攜同妻兒安居的喜悅，⁴⁴尾聯推辭時人以揚雄相比的評論，謙抑中有宅居的安定感。杜甫在秦州、同谷的經驗背景下，珍惜此一發展中的家園空間，「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為農〉，卷7，頁318），似不排除終老於斯的可能。

修建草堂之外，詩人同時規劃園內整體空間的運用。草堂地臨浣花溪，水源充足，便於植栽。園內本就有些原生草木，自不免有些刪汰揀擇，杜甫親執斧柯，參與整治工作，一方面誅茅焚穢，刊去藜莠惡樹，一方面扶植保留之草

⁴³ 杜甫長期居留兩京，時常參與名勝山水貴族園池中舉辦的宴會，即使心志關注所在偏重於政治人事，然對空間形勢特質與人為建設的配合與效果，自然隨著閱歷豐富而逐漸累積一些基本的審美能力。如〈樂遊園歌〉記及樂遊園地勢與借景關係：「樂遊古園峯森爽，烟絲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重遊何氏五首〉記遊何將軍園林，即已留意園林景面與美感，如：「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賸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寫水潭、花竹、壘石、飛瀑，以及平臺閒趣等，已透露詩人的園林審美能力。《杜詩鏡詮》，卷2，頁43、63-69。

⁴⁴ 羅大經云：「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杜詩鏡詮》，卷7，頁316。

木，重作整治。〈惡樹〉詩云：「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枸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卷8，頁354）傳神地寫出庭園整理工作的心情：雞栖雜樹，生命力強，故曰奈汝何；枸杞具觀賞與經濟價值，經剪除遮蔽之惡木藤蔓，始得到適當的養護。杜甫也在園中開闢菜園、藥圃、黍田，所以能即時採摘菜蔬以享客，能為多病之軀自行調養食療，也有黍米收成可以醱釀濁酒，散見於記錄生活的詩篇。

杜甫最喜愛的原生草木當屬草堂邊上的古楠樹，〈高栢〉詩云：

栢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

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卷8，頁353）

老樹既具實用性，蒼鬱的樹冠層可以遮蔭；也提供感官審美，蒼翠的顏色可以悅目，還有風行葉間的清籟可以聆賞；猷古的姿態更演示著時間的縱深度和穩定的力量。杜甫除去了樹下的野草，開墾了一方藥圃，也搭蓋了一座小亭，可以作息其下，時常親近此樹，樹下小憩，特別覺得可以快速長養精神。可惜後來在茅屋為秋風所破的同時，這株老楠樹同時也為秋風所拔，在大風中傾倒。杜甫為作〈栢樹為風雨所拔歎〉，「虎倒龍顛委荊棘，淚痕血點垂胸臆」（卷8，頁364），大樹頹敗，委身於荊棘之中，這種一去難返的形勢，令詩人感受到莫大的悲傷。

所幸草堂另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植栽，那是杜甫在籌劃之初即已用心蒐羅的園林要素，詩集中留存系列小詩：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檜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檜木栽〉

落落出群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

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

〈詣徐卿覓果栽〉⁴⁵

題詠所及植栽種類包括桃、竹、檜木、松、果樹，不包括純觀賞用之草本花卉，也不刻意蒐求名花奇木，只就近募取蜀地生長之品類。它們兼有多重價值，既具實用性，綿竹可編結器物、提供建材；桃、李、梅花果繁密，可製菓釀酒；檜木生長快速容易成蔭，枝樑可作燃料。也具審美價值，諸木樹形與花卉各饒形象美感，竹之清逸，松之蒼挺，梅之古雅，桃之妍麗，都是中土常見植物，杜甫並不陌生。此外，植物比德的文化傳統也為士人熟知，檜木容易成林的無用之用，松樹出群不凋的歲寒之心，也在詩篇中隱約認取。木本植物的栽培需要長時間養護才能枝葉扶疏，杜甫的植物群中，檜木成長較為快速，桃李要多年成株才能開花結果，小松樹苗的長成則要十年以上的等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杜甫的規劃裏，植物的成長天長地久，超越有限的人生，更超越個人擁有草堂的時間，雖未能得見「老蓋千年意」的最終養成，但參與一段養護的過程，本身便是意義。⁴⁶

除了植栽，尚有少數簡單修建工程，前文言及老楠樹下有藥圃和茅亭的整治，此外，臨江可以眺遠，杜甫修有江亭、水檻，可以依憑觀景垂釣，⁴⁷有諸多詩作述寫野望情景，〈江亭〉云：「坦腹江亭臥，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

⁴⁵ 五詩先後相次，俱見《杜詩鏡銓》，卷7，頁313-315。同時另有〈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一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求取之大邑瓷碗為當地所產器物，是作為家人日常之用，或以待賓客，難以確知。

⁴⁶ 王嗣爽稱「公無日不思鄉，而種檜、栽松，若為久住之計，其襟期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為千古宅』，豈偶然哉？」仇兆鰲注〈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引王嗣爽語，《杜詩詳註》，卷9，頁732。

⁴⁷ 江亭、水檻較諸草堂室內生活空間，尤便於賓客來訪時之活動，如嚴武來訪曾一同於江亭垂釣，而有〈寄題杜二錦江野亭〉，杜甫亦有〈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杜詩鏡銓》，卷9，頁390-391。

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卷 8，頁 348）〈絕句漫興九首〉之一云：「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卷 8，頁 356）〈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卷 8，頁 345）〈水檻遣心二首〉之一云：「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卷 8，頁 345-346）江亭野望，看水觀雲，賞花聽鳥，俯仰之際，物色觸動人心，杜甫對於天地間生機流轉與變異亦每多感受，此意下文將再論及。

水亭與扁舟是江邊人家往往備辦之物，⁴⁸ 杜甫草堂既有江亭可倚釣野望，並也買有小舟，可以遨遊溪上，〈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卷 8，頁 357-358），描述與妻子舟遊，看幼子游泳的歡喜心情；〈破船〉：「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卷 11，頁 519），則是數年後暫遊梓州歸來，見小般破敗而興起的回憶。浣花溪水在草堂園外，舟艇水行，以另一形式拓延了詩人足跡所到的範疇，也拓展了園林不涉及具體所有權的邊界，提供與水色風波共遨遊的行動與想像自由。

（二）實踐「民胞物與」襟懷的生活家園

杜甫棄官同時離開兩京，進入秦隴山區，透露歸隱山林的想望，但在秦州、同谷的荒野經驗之後，重新選擇都會地區安身。成都繁華富庶，曾號為南京，⁴⁹ 當時出為府尹、節度使者，多為公卿宰臣，如裴冕、嚴武。因地理上的優位，偏處西南，山川環護，故能免於中原之干戈影響。兼以水土豐美，「富貴優閒，歲時燕集，寢相沿習。……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風流，

⁴⁸ 如〈過南鄰朱山人水亭〉，《杜詩鏡詮》，卷 11，頁 519。〈南鄰〉詩云：「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杜詩鏡詮》，卷 8，頁 330。

⁴⁹ 《通鑑》：「至德二載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上元元年九月，改置南都於荊州。」〈建都十二韻〉題注引，《杜詩鏡詮》，卷 8，頁 337。

亦往往傳為佳話，為世所艷稱。」⁵⁰ 杜甫從同谷來到南都，筆下的人生也從封閉枯寂走向熱鬧豐腴。

以草堂家園為據地，生計煎迫問題一時獲得舒緩，自我價值與人倫關係的重建則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逐步展開。首先，杜甫偕同妻兒入居草堂，重新經營家庭生活，恢復與家人的親密關係。草堂中有菜圃、藥欄、黍田，可以提供部分生活所需，不再主要仰賴他人資助或野生物資。自家澆灌養成收穫的糧食，縱使粗糲，已足以使前此時期「顏色白勝雪」（〈北征〉，卷4，頁161）、「男呻女吟四壁靜」（〈同谷七歌〉，卷7，頁297）的家人重新恢復神采與笑語。⁵¹「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夜喜雨〉，卷8，頁344）、「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卷7，頁318），風調雨順，萬物得到哺育生長，草堂中的杜甫終於走出生機斷滅的絕境，重新感受到創造生機、撫慰匱缺的喜悅。

〈江村〉詩鋪陳了草堂居止數月後的日常情味，老妻、稚子共構的和諧生活讓他深感滿足：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卷7，頁320）

時當盛夏，清江水流似洗去了炎囂，詩人在成都迎來第一季夏天，竟覺「事事幽」。「幽」字勾勒生活環境光影淡微，減弱了夏陽的威熾；也描述生活內容的清簡，減少人際往來的干擾；同時也訴說了生活態度的從容，不再煎迫於飢

⁵⁰ 元·費著：《歲華紀麗譜》，清·永瑔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冊14，卷70，史部地理類三，頁105。

⁵¹ 詩人在成都可能因得故人資助，生計壓力得到緩解，草堂雖闢有菜園藥圃等，但與後來至夔州相較，詩人書寫農耕勞苦之詩相對為少。夔州詩如〈雷〉：「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吾衰尤計拙，失望築場圃」，〈種葛苴〉：「擁塞敗芝蘭，眾多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對於久旱炎枯下的農耕活動，有更為深刻的艱難感。《杜詩鏡銓》，卷13，頁613-614、624-626。

與寒。於是推己及物，眼中梁上之燕、水中之鷗，也莫不親近和善、悠閒去來了。詩人進一步以下棋與釣魚作為夏日生活內容，從準備工作說起，拉長活動的整體時間長度，並讓妻子、兒女參與進來，或者說成為活動的主要角色。你看：妻子以她擅長女紅的雙手正在繪製棋盤，穩練的線條畫出了楚河漢界；你聽：孩子向媽媽要來了繡針，正拿著小鋤頭努力敲彎它，等會兒繫上了長線，到園中取根竹竿，再挖些蚯蚓，就可以去江邊釣魚了。二則事例充滿聲音動作與表情的暗示，詩人是旁觀者、敘述者，也是在準備工作完成後的參與者，夫妻、父子之間已度過了「除呻吟外，別無所有，別無所聞」⁵²的艱難時期。

當然草堂生活不可能都如此悠閒安逸，杜甫前此欠缺農耕經驗，草堂的生計經營情形不很明朗，但顯然無法自給自足，仍需仰賴親友資助，杜家生活依然簡約窮困，有時失援，也不免有「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饑稚子色淒涼」（〈狂夫〉，卷7，頁319）、「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卷8，頁367）的窘境。但是情勢終不復似同谷時期的險峻，「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屏跡三首〉之一，卷9，頁388），縱使年荒乏酒資，杜甫因有草堂園地，仍有著力處，可以加強努力開闢園圃，種植菜蔬，除自給外，尚能賣之以充酤值。所以詩人面對妻子的憂愁長貧、兒女的無禮失學，也能幽默地自我調侃：「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屏跡三首〉之三，卷9，頁389）

現實生活縱使仍有缺憾，杜甫已有走出絕地的優容心境，〈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即以此而為後世所傳誦：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胃長林梢，
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
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
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腳如

⁵² 〈同谷七歌〉楊倫注語，《杜詩鏡銓》，卷7，頁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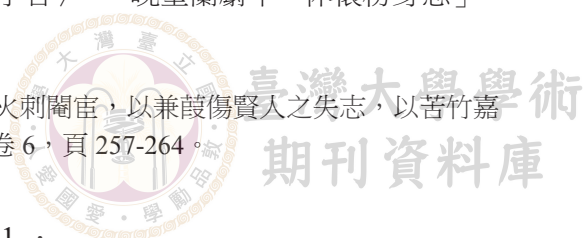


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卷8，頁364-365）

詩中文字表面上描述草堂茅草屋頂為風所壞之窘況，同時卻自然流露了超越個人、自家利害的溫柔情懷，可分三層言之：一為對家中「嬌兒惡臥」的憐惜，布衾使用多年，不復溫暖柔軟，兒女睡不安穩，輾轉反側，加劇了棉絮的斷裂，看在父親的眼裏，只有憐惜不捨。二為對南村群童的諒解，「忍能對面為盜賊」看似嚴厲的指責，但倚杖靜思，群童之所以如此，並非有意戲弄欺侮老人，不也出於飢寒所迫嗎？衣食不足，是以游走在榮辱的邊緣。三為對天下寒士的悲憫，杜甫素有推己及人的胸襟，當年亂事未起，他由家中貧窶有倉卒，推擴及「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卷3，頁111），感受到無邊憂思而無著力處。今日，則因深刻體會一處溫暖安全的家屋是安頓生命的起點，杜甫的悲憫表現得更為具體質樸，並有捨己為人的願力。

杜甫也是在展開漂泊之後，推己及物的情懷也才豐沛地流溢出來。秦州時期有詩詠寫歸燕、促織、螢火、兼葭、苦竹、病馬、蕃劍等物，雖部分沿承《詩經》美刺傳統而微露褒貶，其中多取弱勢微物，推己及物地設想各種微物的特質和處境，流露十分細膩的體察，已逐漸顯露特色。如云〈螢火〉：「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兼葭〉：「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苦竹〉：「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或〈歸燕〉：「春色豈相訪？眾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⁵³ 至成都後，數年江村草堂生活，詩作中出現更為大量的草木蟲鳥，幾乎皆為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之物，而非憑空構思取義。如〈江頭五詠〉以草堂江畔常見之五種動植物為題，詠寫其形象特色、生物本性，隱然投射有自我目前處境的體認。其寫〈丁香〉：「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⁵³ 依楊倫所注題意，因燕而傷羈旅，以螢火刺閹宦，以兼葭傷賢人之失志，以苦竹嘉君子之苦節，諸詩俱見《杜詩鏡銓》，卷6，頁257-264。



表達安於幽僻，不復更懷末路之榮以賈禍；〈麗春〉：「少須顏色好，多漫枝條賸」，呈現花少自好，耿介自守有別於眾；〈梔子〉：「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肯定有用之材，而秉性孤直不合於時；〈鸚鵡〉：「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感傷羽翼殘損，安於義命而不求進；〈花鴨〉：「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警醒宜韜光養晦，過於耿直恐遭世忌。⁵⁴ 另有〈病柏〉、〈病橘〉、〈枯櫻〉、〈枯柎〉等作，針對單一特定對象，在物類總性之上，彰顯其因病而致的變化與結局，如柏樹本為千年根，具偃蹇龍虎之姿，卻因病而柯葉改色；橘實原本色鮮味美，今卻酸澀如棠梨；櫻樹樹皮作繩，久用不爛，因被交橫集斧斤而枯乾；柎樹本具棟樑大材，今卻枯槁而不見用。⁵⁵ 此系詩作隱然接續庾信〈枯樹賦〉的傳統，含有君子大材卻終失路的人事投影，同時也兼有對眼前實物的不忍之情。

此外，草堂中的詩人還寫有許多日常生活的小詩，詩篇中出現許多昆蟲禽鳥、竹木花卉，它們十分自然地進入生活場景之中，成為意興所到、滋味橫生的題材，如〈堂成〉的「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詩人與禽鳥共同擁有溫馨的家庭與家屋。另〈絕句漫興九首〉亦為典型，略舉其二、三、七、八、九數例於下：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卷8，頁356-357）

諸詩已然打破詠物、詠懷界限，桃李桑麥與江燕鳧雉等動植物，直如野老鄰翁

⁵⁴ 杜甫：〈江頭五詠〉，《杜詩鏡銓》，卷9，頁385-387。

⁵⁵ 杜甫：〈病柏〉、〈病橘〉、〈枯櫻〉、〈枯柎〉，《杜詩鏡銓》，卷8，頁369-372。



甚至家人一般，都是詩人真實生活中最為熟悉往來的生命體。草堂簷前有燕子定巢，詩人看著成鳥哺育幼雛，雛鳥逐漸長成，學會飛翔；它們還會飛入室內，銜泥帶草地不免掉落一些泥污，有時更急著捕食飛蟲，橫衝直撞地幾乎要打著人，像極了調皮任性的孩子。又如草堂前種有從蕭八明府實處覓來的桃栽、從果園坊裏求來的李樹，桃李花開爛漫，極是美好，只是江邊風大，往往吹折花枝，詩人十分心疼，也將桃李視為自家孩子般，向春風宣示：草堂範圍內都是我的家人，請不要欺負他們。只是春風不聽，夜來風狂，吹折桃李花枝，挽斷楊柳長條，教人好生憐惜。

與詩人親切有情的花鳥其實不限於草堂範圍之內，浣花溪上的群鷗、鸕鶿，隨水任風，自在嬉遊，詩人也覺日日前來相親，東城樓邊或是黃師塔前的桃花，盛開在繁華與凋謝之間，深深淺淺的花紅，朵朵都洋溢著短暫卻飽滿的生之美好，詩人因草堂的經營，對於日常生活環境中的動植微物，多了一份細膩的觀察，發展了愛物惜物的感情，這也是在他長期懷抱「民吾同胞」的胸懷中，更鮮明地開出了「物吾與也」的襟期。

《孟子·盡心篇上》曾云：「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親、仁民、愛物，是仁者情懷朗現的普遍性，而在具體實踐上又具有親疏差等：只有能夠親愛親人時，才有可能推己及人地去仁愛百姓；只有能夠仁愛百姓時，才有可能愛惜萬物。北宋理學家張載進而發揮此意，指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⁵⁶認為人與萬物並生於宇宙中，全體人類猶如與我血脈相連的兄弟，其他萬物亦與我同源共體，是親愛相處的友伴。

⁵⁶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出自北宋理學家張載的〈西銘〉，〈西銘〉係由其著作《正蒙·乾稱》所抽出之文字，書於西牖以示學者，題曰〈訂頑〉，程頤改為〈西銘〉，認為「是橫渠文之粹者，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不但契合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之精神，亦發揮了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旨義。見北宋·張載著，南宋·朱熹注：《張子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3。

於是，走過亂離的杜甫，並不刻意闡述孔孟學說作為依據，但在日常生活實踐上，既能走入民間，深刻體察當時百姓的苦難與相互扶持的真情，同時也湧發了對有情萬物的關懷，與草木禽鳥同親，自然流露對人們和萬物的普遍關愛深情，可謂具體朗現了一位儒者的真誠仁體。

（三）重整社群關係的詩人身份

來到繁華都會成都，杜甫以草堂為據地，社群關係也展開了新頁，長安時期累積的政治人脈，在秦州尚得少量維持，居同谷則幾盡斷絕。茲入成都，杜甫重新恢復頻繁的社交活動，但在其中調整了自己的身份位置。

成都詩作中先後出現許多交遊的人影，有不知名的野老鄰翁，有當地著名的畫師韋僊、王宰，有名家之孫蜀僧閻邱師兄，有據要路津的嚴武、高適、王侍郎、崔五侍御、王十將軍承俊、李都督表丈等等。詩人與之詩作酬贈，談文論藝，追述先祖才藝，抒發同情共感，詩人走出了長安時期等待拔擢援引的格局，放下了政治生命的追尋，像一位都市行遊詩人般，與各種階層的人物交往。

不具姓名的交遊中，北鄰愛酒能詩，是退休官吏；南鄰好客忘機，或為在地野老。彼此時相過訪，或相約泛舟，有酒時可隔籬呼邀，無酒時可稚子賒取，鄰居間由陌生逐漸親熟了。⁵⁷其餘往來之人，或步行過門，或車馬駐留，主人但取園中菜蔬、家釀舊醅供給，〈有客〉云「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卷7，頁318），〈賓至〉曰「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卷7，頁319），簡單的菜色與邀約有主人真誠的情味。甚且主客情親，亦不妨隔籬呼喚鄰翁共飲同樂，將美好的情意傳揚擴散出去。

杜甫在成都逢識韋僊、王宰、曹霸等幾位畫師，或為在地蜀人，或因戰亂漂泊來此，題贈詩作每每深入畫家藝術特質與生命情境，反映出詩人與畫家的

⁵⁷ 參見〈北鄰〉：「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南鄰〉：「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遣意二首〉之二：「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等詩，《杜詩鏡銓》，卷7，頁329、330；卷8，頁343。

情親與相知。如〈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卷7，頁327-328）五日、十日，極言其醞釀時間之久；不受促迫，表出藝術主體之獨立性；而咫尺萬里，則是藝術家以小攝大的襟懷與能力。〈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寫曹霸為曹操曹髦之後，玄宗朝已得名，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寫人則「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畫馬則「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然而安史亂起，遂成清門庶民，「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卷11，頁529-530）。兩人走過相同的盛世與亂離，飽經滄桑漂泊，異鄉相逢，杜甫更能全幅體察曹霸的人與藝，筆下畫家的才藝、際遇與襟懷，與詩人自己的親身歷鍊猶如鏡像，一顯一隱相互映照。這種天涯漂零生命的相逢相照，超越私人交情久暫，成就一種更為純粹的朋友關係。

至於與官僚人物的交遊，杜甫初抵成都時，有對裴冕「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鹿頭山〉，卷8，頁310）的功德歌頌，對高適「故人分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卷7，頁311）的處境說明，詩人不迴避自己的艱難困境，宛轉表達待援的需要。⁵⁸ 前文述及杜甫興造草堂時，獲得時人資助或主動寄詩索取贊助的情形，王十五司馬表弟、蕭八明府實、韋二明府續、何十一少府邕、韋少府班、徐卿等人多具官職，此番為草堂營建出力效勞，杜甫詩札語氣輕鬆戲謔，如對多年好友，可以見出杜甫並不排斥重新建立與政治官僚的聯繫，甚至也明白資藉官僚體系的上下層結構關係可以獲取小小助益。⁵⁹

⁵⁸ 杜甫：〈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杜詩鏡銓》，卷7，頁313。

⁵⁹ 陳貽焮先生即指出：「在以浣花村為中心的方圓幾百里內，居然動員了好幾位官員和士紳來為修蓋草堂、美化環境、充實家什效勞，要是絲毫不依傍象（應作像）裴冕這樣的大員的提攜，光靠他個人的地位和影響，那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只要回想一下老杜在秦州在同谷的狼狽處境就知道了。」《杜甫評傳》，中卷，頁645。

成都數年，杜甫與官僚體系中之人物往來頻繁，尚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奉簡高三十五使君〉、〈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寄贈王十將軍承俊〉、〈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寄杜位〉、〈敬簡王明府〉、〈徐卿二子歌〉、〈徐九少尹見過〉、〈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卻歸，聊寄此詩〉、〈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贈別何邕〉等大量詩作。往來人物身份有侍御、侍郎、將軍、都督、少尹、使君、司馬、功曹、判官等，另有權臣名士之後，如杜位為李林甫之婿，閻邱師兄為太常博士閻邱均之孫。杜甫順隨各種人事因緣而有接觸往來與聯繫，有時不免於應酬，如〈徐卿二子歌〉之祝頌。也有關於公共建設議題，如皂江上建造竹橋，以利涉渡。其中仍時時可見動人的真誠友誼自然流露而出，如在王掄侍御與高適同訪草堂時勸高適多飲之戲語：「移樽勸山簡，頭白恐風寒」（〈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卷8，頁376），寄詩予遠在廣州的張判官：「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卷8，頁381），贈別綿谷尉何邕：「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贈別何邕〉，卷8，頁382）等，不論舊雨新知，高官微吏，漂泊遠來的杜甫都流露了同樣珍惜的情感。

蜀地交遊中，杜甫與嚴武關係密切不待贅言，嚴氏兩度鎮蜀，提供杜甫有形無形的資助，二人政治地位懸殊，然過從頻繁，酬贈往來，可見交情。試讀〈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
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卷9，頁400)



嚴武有時攜備酒饌，來尋草堂中的老友喝酒釣魚，在竹林邊上設立臨時廚房，裝備華麗的車馬就停駐在桃李樹旁，兩人或者吟詩相和，或者在江亭上垂釣，或者就靜看漁舟浮移於向晚的江水之上。詩中將富貴 / 貧賤、華侈 / 簡樸、喧鬧 / 幽寂等原本相對的事物和現象並置在一起，卻並不衝突，自然一方面是嚴武彼端的「將軍禮數寬」，具有禮賢下士的胸襟，一方面則是杜甫此端的「事業闇相親」（〈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卷 9，頁 395），以文學作為二人的共同事業，將二人友誼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這是杜甫棄官以來即試圖建立的新價值，只是秦州、同谷時期迫於飢寒，此意未得豁然開朗，如觀其寄書予高適、岑參，感慨我獨淒涼之餘，全詩以詞客詩才貫串，詩末期待亂後重逢，結以「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卷 6，頁 271-274）已意圖定調於詩文交情，然未獲具體回應。來到成都，方其以受難遇困的寒士形象進入蜀地士紳交遊圈，坦然接受資助重新安頓生活，同時也調整自己的身份與心態，重新尋覓他在新世界的位置。草堂初成時的〈賓至〉已透露對此一問題的自覺，詩中未指明訪賓為誰，但與〈客至〉並觀，顯然指向有社會地位的人士，⁶⁰ 詩中「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卷 7，頁 319），謙退中同時拈出「文章驚海內」的自信自任心情，並以嚴謹的筆法展示文章的能力，遂能以寒士貧儒與冠蓋賢達從容應對。此後以草堂為據地，杜甫以詩人身份進行社交，寄成都陶、王二位少尹詩云：「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卷 8，頁 359），答謝范邈、吳郁來訪的「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卷 8，頁 375），贈別魏侍御的「遠尋留藥價，惜別倒文場」（〈魏十四侍御就敝廬相別〉，卷 8，頁 381），都在嘆老嗟貧中，拈出詩文作為自己與諸人

⁶⁰ 楊倫引陳秋田云：「賓是貴介之賓，客是相知之客，與前〈賓至〉首各見用意所在。」

《杜詩鏡銓》，卷 8，頁 342。仇兆鰲引張綆注：「前有〈賓至〉詩，而此云客至，前有敬之之意，此有親之之意。」《杜詩詳註》，卷 9，頁 793。

交往的憑藉所在。

此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演示了一場重新確認自我價值的短劇，詩中描述自己面對成都春景的壓力與和解，前二首云：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敲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卷8，頁354-355）

春來天地，生機蓬勃，繁華似錦，對於飽經喪亂、處於人生之秋杜甫而言，那是一個不相應的季節，甚至帶有逼迫挑釁的意味，所以言「怕」、「惱不徹」，無力對抗時，只能「顛狂」、「行步敲危」，求助外力扶持，具象地承認自己作客成都無以自立的不安。他試圖確認自己生命尚有支撐之力：「詩酒尚堪驅使」，詩尤為重心所在。所以〈宗武生日〉也才會提出：「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卷9，頁413-414），對鍾愛尤深的宗武流露克紹箕裘的期許。

「詩人」是他認取的新的身份，草堂作為詩人的據點，草堂中的杜甫儼然如成都的駐市詩人。人因地安，接受地方官吏與親友聯手提供駐地與部分物資，建設浣花溪畔成為詩人安居的草堂；而地因人重，因為杜甫的關係，草堂也迴出於一般民家之外，成為當地官吏或者因事訪蜀的官吏往往拜訪的處所。詩人生活其間，大量寫詩，詩的寫作與傳播安慰了詩人，也逐漸累積草堂的人文記憶，終於成為成都的一處醒目地景。

（四）聯繫東方家國關懷的流動水系

棄官改變了數十年來追求入仕的方向，所謂「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二十，卷6，頁247），實兼具諷、頌雙向意涵，在頌贊天子聖明之外，也感慨帝王自限，拒絕臣僚的善意諫言。詩人收回了致君堯舜的自許，走向民間，自居平凡百姓，但君國之思依然纏繞，只是將獻身於帝王與中樞朝廷的忠悃，轉成對於時局、戰略乃至朝廷人事變動的關心。初赴秦州，地當邊防關隘，西出吐蕃驛道所經，是以可聞邊城胡笳之聲，也往往可見使節來

往與兵馬馳驅，傳遞著世局尚未平定的訊息，這些都成為秦州詩詠的成分。⁶¹及至同谷，距離京師遙遠，消息傳遞更加困難，不復有邊塞烽燧，也失去了可以觀察時局的具體線索，所以〈同谷七歌〉中胡塵暗天，弓箭滿眼，僅能以想像性的畫面呈現邦國世界的動盪影像。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生活，詩人走出同谷的幽居封閉狀態，他如何安置君國之思？

草堂門前的溪水連通大江，大江自西徂東，流向群山萬壑之外的東方，一開始就決定了草堂開放的性質。就園林的物質性空間而言，即使住宅區設有小小柴扉由主人自由啟閉，但草堂整體園區似無嚴格邊界，未見設定可以完全控制整座園林的開關建設。尤其臨江一面，浣花溪水雖然也有標示邊界的作用，但水同時也是流通聯結的載體，經由浣花溪 → 錦江 → 岷江 → 長江的水流網絡，一程一程推擴開去，江水流動，舟楫往來，草堂與成都、蜀地乃至整個家國，始終保持緊密的聯繫。草堂的這一開放性，恰與同谷的封閉性形成強烈的對照，園林主人的心靈空間也因而活潑流動起來，前文所論詩人與妻子兒女乃至動植微生物細膩親愛的互動，或者嘗試以詩人身份重整與父老或仕紳的關係，都可視為突破同谷封閉狀態後的積極努力，遂得以草堂為據點，開展出豐盈嶄新的局面。此外，浣花溪的水系網絡，也為詩人與君王、帝都、中原重新調整了新的相關位置，〈野老〉詩云：

野老籬邊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
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卷7，頁321)

⁶¹ 以〈秦州雜詩二十首〉為例，「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其六)「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其十一)「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其十五)、「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其十八)、「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其十九)諸詩皆流露詩人對時局的關懷。《杜詩鏡詮》，卷6，頁241-246。又如〈寓目〉：「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日暮〉「羌婦語還笑，胡兒行且歌。」也透露對吐蕃的憂慮。《杜詩鏡詮》，卷6，頁253-262。

江水連通上下游，地理空間可分別向東西兩個方向開展。但詩人眼光追隨賈客船隻由西向東移動，望向他內心始終牽繫的東方：東北方向有崢嶸崔嵬的劍閣，守著劍門天險，原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但那卻是玄宗當年倉皇避難所經的處所，詩人〈哀江頭〉曾嘆息「清渭東流劍閣深」（卷3，頁123）。順江水而下，視線與情懷引向大江南北，更遙遠處則有仍在戰塵中尚未收復的京東諸郡……。

原來詩人在努力安頓夫妻、父子、朋友、物我的倫物關係之時，並未懸置君臣一倫，只是君臣關係不再侷限於個人知遇與才具發揮之訴求，而是一種更不帶個人目的性的關懷。因為棄官，遠離行政中樞，解除了和肅宗朝廷的緊張關係，這份超越現實利害考量的情懷反而得到從容的滋養，也讓他擁有了新的位置和發言權。

於是，草堂詩中也往往涉及時事，如〈杜鵑行〉的「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卷7，頁326），感傷玄宗遷移西內、肅宗不復定省之事；〈出郭〉的「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卷7，頁334），憂心東都復為賊陷，西方吐蕃逼近的形勢；〈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的「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卷11，頁533），提醒戰亂延續十年帶來的滿目瘡痍。……這樣的關懷始終延續，是以隨後順江東下密集有詩，如〈青絲〉的「青絲白馬誰家子？寵豪且逐風塵起」（卷12，頁576），言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之事；〈三絕句〉的「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卷12，頁576），記下混亂失序的在地時事；〈遣憤〉的「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卷12，頁577），則憂憤回紇的恃功邀賞，恣行暴掠；〈客居〉的「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安足吞」（卷12，頁584-585），由蜀中近來亂事談起，冀盼朝廷起用能臣，掃除外寇。杜甫雖自陳儒生老無成，但忠君愛民之情始終貫串，草堂生活並未圈圍起個人或家庭的小小世界，影響杜甫對於君國軍政情勢的關懷。

也是這份君國關懷交疊在地方情感之上，所以杜甫仍常以成都為客旅之

地，是以云「久客惜人情」（〈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卷9，頁394）、「眼見客愁愁不醒」（〈絕句漫興九首〉之一，卷8，頁356）、「南京久客耕南畝」（〈進艇〉，卷8，頁357）、「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出郭〉，卷7，頁334）等，牽繫中原、憂思難抑的客愁，終於使詩人永遠地告別了草堂。

五、結語

杜甫離開兩京，西行經秦州、同谷，而後來至成都，居留浣花草堂，是一連串行動的組合，每一項行動的發生，都是杜甫因應外在環境的因素，從而作出判斷與回應，彼此之間又相互聯結，形成一組行動鍊。上文的探討旨在呈現此一行動鍊組的推進過程，提出「倫理世界的重構」作為總題，倫理的意涵包括人與親人、社群、君國以及自然萬物的關係，以及處理此等關係的原則。是以由杜甫棄官離京的多重性意涵談起，其次尋索杜甫何以不能安居秦州、同谷，一再展開流動的過程，最後闡述成都浣花草堂的建構及其倫理實踐意涵。藉由整體流動經驗的觀照，彰顯杜甫如何由倫理關係的匱缺感受，逐步尋求彌補重整，而浣花草堂恰好作為一段停駐的里程，杜甫得以在其中逐步舒展人性體驗，重整與人倫品物的關係。

浣花草堂作為唐代早期文人園林基型之一，學者往往與王維輞川別業、白居易履道宅園、廬山草堂並置。⁶² 實浣花草堂造園手法平實，主要借取浣花

⁶² 如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以白居易履道坊宅園為城市私園代表，輞川別業為依附於莊園的別墅園，浣花溪草堂為獨立建置的郊野別墅園，廬山草堂為建置在山嶽風景名勝區內的別墅園，頁90-100。陳從周主編：《中國園林鑒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在「園林沿革」項下「隋唐園林」列出五座私人園林的代表，浣花草堂亦為其一，頁953-956。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討論五座唐代重要文人園林，亦包括浣花草堂，頁83-172。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談唐代園林的分類，亦舉杜甫浣花草堂為私家園林代表之一，頁13-19。

溪的水景以及西嶺的山嶺，內部僅有簡單的堂亭建築，加上大量植栽，表現出由六朝莊園過度到文人園林的中介樣貌。其中並無特出的理水置石等藝術創造手法，如白居易之經營廬山草堂、履道宅園；似亦無明晰之景象結構概念，未一一為個別景象命名賦義，如王維輞川有分景命名；甚至不如裴度、牛僧儒、李德裕諸人園林的築山穿池，多聚珍木怪石，擁有豐富珍奇的園林要素。從園藝美學的角度而言，浣花草堂並不突出。⁶³

但是，浣花草堂另有勝場，它作為杜甫生命流貫朗現的地方，飽含詩人多元感官能力與思想判斷取舍的綜合經驗，與杜甫一生的情感、責任、記憶相聯結，因詩人的含容、參與、關懷而生發意義，轉化成涵蘊人文與生命意義的空間。雖然駐留時歲有限，詩人以開放的心態重新面向全體有情人世，體現儒者民胞物與的襟期，卻是其漂泊生涯中最安定而顯豁的時期。相較之下，王維輞川別業、白居易履道宅園、廬山草堂等文人園林主流，傾向於背離社會人群，也弱化了家庭人倫關係，走向個人自得的內在世界，引領了宋明以降園林壺中化的發展路向。⁶⁴ 杜甫浣花草堂則展示了不一樣的生命格局與人文意涵，筆者認為正是杜甫的影響力滲透進後代文士的園居心態，傳承著覺知的高度，接受

⁶³ 因而也有許多學者的園林史回顧中，杜甫並不在舉證名單之內，如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3年）；劉天華：《畫境文心——中國古典園林之美》（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王毅：《翳然林水——棲心中國園林之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⁶⁴ 「壺中化」指文人園林走向「壺中天地」的發展傾向，在有限的園地創造出深廣豐富的藝術空間，與紅塵隔絕，主人可自由啟閉，一如傳說中賣藥翁的肆頭小壺。王毅即曾指出「壺中天地」為中國古典園林在中唐以後的基本空間原則，見氏著：《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編第六章第一節，頁137-148。影響壺中化走向的典型首推白居易，廬山草堂尚屬實驗，履道園則以暮年歲月投入踐履，成為壺中天地的典範。詳細分析請參見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94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73-101。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現實世界中的層層磨難，在一程程的經歷中學習調整，涵泳缺憾，生命遂得以在磨鍊中日趨厚實；而文人園林也在走向私人天地的主流中，同時得以保有現世關懷和開放性格。

後記：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唐代文人園林的景象建構與空間意蘊」（計畫編號：NSC98-2410-H-002-197-MY3）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審查先生與編輯委員會提供珍貴建議，助益筆者增刪修訂，謹此一併誌謝。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杜甫著，清·錢謙益：《杜詩錢注》，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
-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 唐·杜甫著，清·楊倫編輯：《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 北宋·張載著，南宋·朱熹注：《張子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明·單復：《讀杜詩愚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影印明宣德九年江陰朱氏刊本。
- 明·計成著，黃長美撰述：《園冶》，臺北：金楓出版社，1999年。
- 清·吳瞻泰：《杜詩提要》，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影印清乾隆間羅挺刊山雨樓藏板。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9年。
- 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二、近人論著

- * 方瑜：〈困境與突圍——以杜甫〈同谷七歌〉與〈秋興八首〉中的春意象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9期（2008年11月）。

DOI:10.6258/bcla.2008.69.05

- 方瑜：〈浣花溪畔草堂閒——論杜甫草堂時期的詩〉，《古典文學》第2期（1980年12月）。
- 王文才、王炎編著：《蜀志類鈔》，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
- 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王毅：《翳然林水——棲心中國園林之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呂正惠：〈杜詩與日常生活〉，《唐詩論文選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85年。
- 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李欣錫：《杜甫巴蜀詩「生活」題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陳文華、沈秋雄、蕭麗華先生指導，1999年6月。
- 周武忠：《中國園林藝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3年。
- 周維權：《中國古典園林史》，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孟亞男：《中國園林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 侯迺慧：《詩情與幽境——唐代文人的園林生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
- 孫永忠：〈愛花欲死杜陵狂——談隱逸為杜甫開啟新生命情趣〉，《輔仁國文學報》第27期（2008年10月）。
- 許世榮：〈論杜甫成都詩和成都杜甫草堂〉，《杜甫研究學刊》2011年第2期（總第108期）。
- 張家驥：《中國造園史》，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
- 陳從周主編：《中國園林鑒賞辭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 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 曹淑娟：〈從杜詩鷺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淡江中文學報》3期改版（1996年12月）。
- 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

總第 94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 * 曹淑娟：〈江南境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5 期（2011 年 12 月）。DOI:10.6281/NTUCL.2011.35.03
-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 黃美娥：〈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的內心世界〉，《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3 期（1994 年 6 月）。
- 蒲向明：〈論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09 年 2 月）。
- * 廖美玉：〈漫遊與漂泊——杜甫行旅詩的兩種類型〉，《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 年 12 月）。DOI:10.6281/NTUCL.2010.33.06
- 劉天華：《畫境文心——中國古典園林之美》，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 劉孟伉：〈讀詩小記——〈同谷七歌〉的時間和地點問題質疑〉，《文史雜誌》1985 年 2 期。
- 劉孟伉編：《杜甫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1 年。
- 閻云翔著，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簡錦松：〈從現地研究看杜甫秦州入蜀詩的旅行日期〉，《東吳中文學報》第 22 期（2011 年 11 月）。
- 簡錦松：〈杜甫夔州生活新證〉，收入謝海平主編：《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 * 蘇怡如：〈杜甫成都草堂詩之隱逸書寫析探〉，臺師大《國文學報》53 期（2013 年 6 月）。
- * (日) 川合康三：《杜甫》，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
- (美)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譯：《初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年。
- * (美)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譯：《盛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年。



(美) 艾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Y.-X. (1988). *Du fu ping 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Du F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Fang, Y. (2008). Predicament and escape: On the images of spring in Du Fu's poems "Tonggu qige" and "Qiuxing bashou."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69, 127-147.
- Kawai, K. (2012). *Du fu* [Du Fu]. Tokyo: Iwanami.
- Liao, M.-Y. (2010). Wander and exile: Two types of Du Fu's traveling poems.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3, 225-266.
- Owen, S. (2007). *Sheng tang shi*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Jia J.-H., Trans.). Taipei: Linking.
- Qiu, Zh.-A. (Annot.). (1980). *Du shi xiang zhu* [Du Fu's complete poems with detailed annotations]. Taipei: Le J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Su, Y.-J. (2013). The theme of solitude in Du Fu's Cheng Du Cao Tang poetry. *Bulletin of Chinese*, 53, 119-147.
- Tsao, Sh.-Ch. (1996).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reality of existence demonstrated in the Tu Fu's poems on falcon. *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3, 113-144.
- Tsao, Sh.-Ch. (2011). Objects from Jiangnan and the "universe in the pot": The aesthetic of Bai Ju-Yi's Lu-Dao Garde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5, 85-124.
- Yang, L. (Ed.). (1990). *Du shi jing quan* [Du Fu's complete poems with revisions and annotations]. Taipei: Hua Che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